

试论《水浒》中的宋江

张德学

在以描写农民起义为题材的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中，作者施耐庵塑造了一位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宋江。如何评价宋江，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待这个问题，和对待《水浒》这部作品一样，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我看到的专论宋江的文章不很多，但看到的众多评论《水浒》的文章涉及评论宋江的倒比比皆是。在这些专论或兼论宋江的文章中，对待宋江的评价众说纷纭，其意见大体可归结为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宋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正面人物。他虽然有忠君思想，后来让封建朝廷招安了，但仍不失为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在他身上具体体现了农民阶级优秀的品质、性格和才能；另一种意见认为，宋江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反面人物。他被迫上梁山参加起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后来受招安，统统是受忠君思想支配的。他身居梁山，心在朝廷，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自一九七五年“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掀起评《水浒》浪潮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又异口同声说宋江是一个应该大批特批的反面教员。他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是农民起义事业的叛徒、内奸，是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千古罪人。粉碎了“四人帮”，人们认清并批判了他们利用评论《水浒》妄图打倒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恶阴谋，对《水浒》的评论突破了“反面教材”的禁区，但对宋江的评论基本上还是“反面教员”的调子。我认为，以上这些说法有的是欠妥的，有的是十分错误的。这些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有阶级立场不同和政治用意不同的原因，也有人民内部认识不同的原因。在人民内部认识之所以不能一致，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宋江是一个思想充满矛盾的典型形象，论者往往注重他思想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简单地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结论。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宋江是一个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有些论者又把他看成今天的人物，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衡量他，错误地做出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研究问题要“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具体问题做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力戒形而上学片面性。遵照这些基本原则，我想就《水浒》中宋江这一人物形象谈一些粗浅的看法，通过对宋江这一有争论人物的评论，试对如何正确评论古代作品中的历史人物做一些探讨。由于自己理论水平所限，力难从心。错误之处，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宋江形象的真实性的真实性

在历史上，宋江确有其人，宋江起义确有其事，这都见几种史书记载，无人置疑，用不着引经据典的。据这些史书记载，宋江是北宋末期人，勇悍狂侠，其才过人。他领导了三十六人为首的农民起义队伍，纵横转战，所向披靡，使宋王朝官兵闻风丧胆，给封建统治者造

成很大的威胁。关于宋江起义的结局，有说是被宋王朝平定的，有说是被招降的，有说是被招降后又去打方腊的。总之，他领导的农民起义最后失败了。然而，宋江等农民起义英雄的崇高形象却深刻铭记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心里，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英勇作战的传奇式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间大量流传开来，也很自然成为民间艺人讲述“说话”、演唱“杂剧”的重要题材。当时的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遭受着重重压迫，内心有着种种不平，因而在描绘和讲述宋江这些“除强扶弱”、“劫富济贫”的起义英雄时，往往寄托自己反抗封建统治和剥削的愿望，用自己的斗争经验和事迹来丰富和补充宋江起义的故事，创造自己理想的英雄形象，从中吸取斗争的力量、反抗的勇气。到了元末明初，具有进步思想的封建知识分子施耐庵在长期积累的人民群众创作的基础上，写成了以反映宋江起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水浒》。他根据关于宋江的历史事实和民间传说，经过取舍加工，在书中塑造了一个艺术形象的宋江，选择了宋江参加起义后接受招安去征方腊的结局。这样，从历史宋江到小说宋江的演变发展概况中我们可以知道，尽管有宋江接受招安去征方腊的一些说法，小说宋江和历史宋江或不尽相似，或大有区别是可以肯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论者却以此为理由，矢口否定了《水浒》中宋江的真实性。指责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是对农民起义领袖形象的严重歪曲。并有人经过详尽考证，以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没有征方腊为据，指责施耐庵是为了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用软的一手镇压农民起义的政治需要，歌颂投降主义而主观臆造的一个投降派形象，歪曲了农民起义领袖人物的本质，在艺术上是现实主义的败笔。这种观点，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历史人物的真实和小说人物的真实应是有着联系又有着不同的两码事，不能把历史人物和小说人物简单地划等号。小说人物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这种真实，取之于历史人物的真实，又在历史人物真实事迹的基础上加以艺术加工改造，使人物形象更集中、更典型。这种艺术加工改造，对于小说家来说，不但是容许的，而且是必须的。小说家不一定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文艺作品不同于写历史传记。艺术上绝对的写实，不仅不可能，而且不合理。假使以绝对的写实为理想，则艺术部门中的绘画、雕塑早就应该毁灭，因为已经有照相术发明了。做为小说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时代精神而不必为历史事实所束缚。小说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以虚构或夸张，也可以推翻历史成案，对于历史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具体地把真实的历史精神反映到作品中去。以上说的都是些常识。关键的问题是，这虚构和夸张，这新的解释和阐发，必须符合历史的时代精神，必须反映历史的本质真实。也就是说，不必真有其事，但必须实有其情。综观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结局，不外乎有下面几种情况：一、斗争中或斗争失败而壮烈牺牲；二、斗争受挫折或失败后而隐退，偃旗息鼓；三、斗争中由于某些原因而投降；四、斗争胜利后而变质，成为新的封建统治者。做为文艺作品要塑造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当然写第一种结局能较好地反映他们的本质和主流，但决不能说只有写第一种结局才能反映他们的本质。写其他几种结局，只要写得成功，也是能反映他们的本质的，因而也是真实的。《水浒》中的宋江是第三种结局，作者在塑造这个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形象时，尽管掺杂着一些概念化的语言，远不比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人物栩栩如生，但作者还是忠于现实的，写的基本上是成功的。在宋江的身上，既表现了一些农民起义领袖的思想革命性、斗争坚决性、优秀的品质、性格和才能，又表现了他们的斗争妥协性、不彻底性、缺点、弱点和错误，不失为艺术典型

的“这一个”。我们应该把历史上的宋江和小说中的宋江区别看待，历史宋江究竟后来投降与否，那是历史学家考据的事情。小说这样写宋江，具有艺术真实性，因而也符合历史的真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农民起义领袖的本质。

二、宋江思想的矛盾性

前面已经说过，宋江是一个思想充满矛盾的人物，我们要正确评价他，就必须具体分析他思想矛盾的诸方面，以及产生这些矛盾的阶级的历史的根源。

宋江“上有父亲在堂，母亲早丧，下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自和他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可见他家是小地主家庭。他本人“在郓城县做押司”，是一个小吏。这样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使宋江能够较多地直接接触劳动人民。一方面，他有正义感，讲义气，同情劳动人民和起义英雄，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书中说他“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人向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赍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晁盖等七人劫生辰纲事发，他敢“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前往通风报信，放晁盖等七人逃奔梁山。这些都说明了宋江思想的进步性。但另一方面，宋江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对于劳动人民和起义英雄只能是限于同情而已。长期的封建思想教育，使他对农民起义的认识是错误的，反动的。他说农民起义虽然是“为人所逼，迫不得已”，总不免是“犯了弥天大罪”、“灭九族的勾当”、“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不忠不孝”。他所希望要走的人生道路，无论如何不是参加起义，而是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为封建朝廷出力卖命，鞠躬尽瘁，做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只是在奸臣当道、官府昏庸的情况下，他的忠心不但不能被赏识，才干不但不能被重用，反而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迫害：他想尽忠，杀了阎婆惜不得不流亡江湖；他想尽孝，刚返回家中又被刺配江州；他有感于不能尽忠尽孝的境地，吟了一首属于发牢骚而并非真反对朝廷的“反诗”，结果给送上了断头台。这样，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宋江，不得不违心地走向了起义造反的道路，背叛了他原来的阶级，由农民起义的同情者变成了农民起义的参加者。闹了江州上梁山前，宋江对晁盖说：“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投托哥哥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

宋江上梁山后，作者极力赞扬了他做为农民起义领袖应具备的那种品质、智慧和才能。他有较强的号召力和政治影响，使得四方豪杰如百川入海，纷纷会集梁山。这其中既有被推荐来的，有慕名归顺的，有从战场上招抚的。总之，许多零散的反抗力量经宋江之手聚拢起来，壮大了梁山农民起义队伍。他能团结人，讲民主，平等待人。起义队伍内部，人们不分贵贱高下，一律称兄道弟，凭秤分金银，大碗吃饭肉。他领导这支起义队伍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军纪严明”，而对贪官污吏、地主恶霸则水火无情，主动出击，把他们的威风一扫而光。徽宗皇帝的大舅子慕容知府、蔡京儿子蔡九知府的帮凶黄文炳、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华州贺太守、大名府王太守、东平府程太守、曾头市曾长官、祝家庄祝朝奉等血债累累的坏蛋们一个个被杀了头。起义英雄们动不动“拔寨兴师”让封建统治者尝尝农民革命造反

的厉害，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使官僚地主、土豪恶霸们不寒而栗，坐卧不安，严重地震撼了宋王朝的江山。梁山起义队伍这令人振奋激动的军事行动，表明了宋江做为起义领袖的思想革命性、斗争坚决性。但另一方面，宋江在参加起义后，又表现了思想妥协性、斗争不彻底性。他自幼攻读经史，封建正统观念在头脑中根深蒂固，使他虽然在行动上打击了封建统治者，思想上却对封建统治者温情脉脉，藕断丝连。在他心目中，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皇帝是好的，只是被奸臣蒙住了双眼。所以他不赞成推翻皇帝，自立为王。他一再表白自己对朝廷“并无异心”、“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参加起义只是“替天行道”，替皇帝惩罚奸臣。正因为他有这种思想，所以随着梁山起义队伍对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节节胜利，他越觉得具备了让皇帝招安的资本，投降朝廷的心情越迫切，以至使梁山起义军终于被封建朝廷招抚利用了。

宋江的受招安，标志着梁山起义队伍以变质而失败。宋江受招安后，一方面为能够归附朝廷名正言顺地给国家出力而踌躇满志，深被起义兄弟们南征北战、所向披靡的军事力量所欣慰鼓舞。立志做一个封建朝廷的忠臣，以实现其“保民安国”的政治抱负。但另一方面，在奸臣当道，起义兄弟们“劳而无功”、受尽窝囊气的冷酷现实面前，他又为“尽忠报国”的道路走不通而忧愁苦闷。“忧国家，哭兄弟”，苦于找不到一条既能忠君又能使起义兄弟们扬眉吐气两全其美的出路。最后，在起义兄弟们伤亡殆尽，朝廷又赐药酒给他的情况下，他为了让一生的“忠义”清名流芳后世，“宁朝廷负我，我决不负朝廷”，安然地喝了药酒，糊里糊涂地死去了。

综上所述，宋江上梁山前是封建统治阶级营垒中具有比较进步思想的下层知识分子。他上梁山后做为农民起义领袖，有着严重的缺点、弱点和错误。由于他的错误，导致了梁山起义队伍的受招安投降，在他的思想中聚集着种种矛盾，并且这些矛盾又都交织在他的行动里，表现在他的领导路线上，使他成为梁山起义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成为梁山起义队伍变质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宋江的忠君思想

宋江是有着严重忠君思想的，这种思想一直在他头脑中占主导地位。所以他迟迟不肯上梁山，后来上了梁山，马上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制定了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起义路线，以至主动让朝廷招安了。如何看待宋江的这种忠君思想，我认为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不宜简单地给以否定。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忠君思想，归根结底是一种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麻痹劳动人民反抗斗志的精神鸦片。他们的思想家炮制了一个叫做“天”的至高无上的一切人的主宰，把皇帝说成是“天子”，是“天”派他来人间统治人民的。贵贱、高下、贫富的差别是上天规定，不可改变。劳动人民必须忠于皇帝，逆来顺受，安分守己，听任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不得有半点不满和反抗。但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忠君思想不仅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奉行，还为农民阶级所奉行，它是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在农民阶级中，一些受封建教育影响较少、思想较解放、反抗斗争性较强的人，当然能冲破这种忠君思想的

束缚。如李逵、朱贵等人，公开声明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皇帝的权威根本不在他们眼里。但做为农民阶级中的大多数人，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统治阶级的欺骗，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忠君思想，即使在他们起来反抗朝廷后也在所难免。他们直接接触并深恶痛绝的是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天高皇帝远”，认不清皇帝的封建统治阶级总代表的丑恶面目，视皇帝为美好的化身，只反对贪官污吏，却拥护好皇帝。出身渔民的阮小二、阮小五在和官府第一次交锋时唱道：“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给赵王君”。我们决不应该看做这是封建文人强加给二阮的，而从他们嘴里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再则，对忠君的理解，也因人和阶级不同而有所不同。封建统治阶级把农民起义造反看做不忠，把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看做尽忠。劳动人民中一些人却把贪官污吏横行霸道鱼肉百姓看做不忠，骂他们“奸臣”，把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看做尽忠。还有一些人视“君”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把投降卖国看做不忠，把反抗侵略、保卫国家看做尽忠。所以，忠君思想又是一个内容颇为复杂的概念，它既有反动的、落后消极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又有较为积极进步的因素。

关于宋江的忠君思想，具体体现了他思想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和封建统治阶级一样口吻地骂农民起义为“不忠不孝”，“犯了弥天大罪”，另一方面他又把农民起义看做是替皇帝惩罚奸臣，曲线尽忠。同时他还把尽忠理解成“尽忠报国”，“为国家出力”、“保民安国”。因此，我们决不能把有无忠君思想做为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从而把宋江打入反革命的行列。《水浒》中说高球“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是一个闭塞皇帝的奸臣，难道我们能由于他无忠君思想而把他看成是革命派吗？显然不能的。

有些论者把宋江在忠君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起义路线说成是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指责这条错误的路线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了。他们引用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说如果执行晁盖的“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正确起义路线，梁山农民起义就会胜利。我认为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和“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明显区别。“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表现了宋江的思想妥协性、斗争不彻底性。这条路线是把梁山起义军引向变质失败的直接原因。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入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做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些历史的局限，是农民起义总归于失败的根本原因。梁山起义军即使执行晁盖“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起义路线，最后的结局也会以其他的形式陷于失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和“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枪弹同样可以制敌人于死命，同样可以沉重打击封建统治阶级。宋江认为当今皇帝好，只是被奸臣蒙住了双眼，从而拥护当今的皇帝；晁盖认为当今皇帝不好，要打倒它，从而取而代之。在这种意义上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和“既反贪官、又反皇帝”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把二者简单地比附现代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是不妥的。

四、宋江的受招安投降

我们现在《水浒》的读者，往往对宋江的受招安投降抱以讨厌憎恨的情绪，认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革命者不成功便成仁，无论如何不应该投降；这是起码应具备的品质。存在这种思想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看惯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对敌斗争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壮烈事迹，同样，在历史上失败不动摇、至死不回、宁折不弯的农民起义英雄也不乏其人。但是，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由于历史的局限，在农民起义最后总归陷于失败的结局中，受朝廷招安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它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具体原因和表现形式，有着不同的教训意义。我们应当对此类事情做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研究，不能把受招安统统说成是出卖革命的卑鄙行为，把受招安的人统统说成是叛徒、内奸。

在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中，有些起义军接受招安，这不仅和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农民起义的阴谋诡计相联系，而且也和其他种种缺点、弱点相联系。总之，它是由各种历史的原因造成的。首先，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引诱、收买和分化政策下，起义队伍中投机分子的出卖叛变，是造成许多受招安事情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在封建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下，农民起义军濒于失败对斗争失去信心时，起义军内部出现不团结现象、发生内讧时，也会容易发生受招安一类事情。另外，受招安也有出于以下原因的：譬如，农民起义军对封建皇帝抱有幻想，希望由好皇帝和清官忠臣们来统治，只是把仇恨集中在奸臣贪官身上。当封建朝廷受到沉重打击迫于压力做出某种让步表示时，农民起义军也容易产生妥协思想，停止斗争，接受招安。再譬如，当外族入侵，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为次时，农民起义军也会出现由封建朝廷收编共同反抗侵略的现象，如此等等。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受招安一类问题，要充分认识它的复杂性，认真分析它的复杂起因及表现形式。这样，才能正确吸取受招安的不同的教训意义，才能区别清楚受招安的人的不同面目。

宋江的受招安，是属于一种什么情况呢？他受招安的原因，他自己说得很明白：“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这就是说，宋江希望能在好皇帝的旗帜下做一个忠臣，“尽忠报国”，以实现其“为国家出力”、“心中愿平虏，保民安国”的政治抱负，在历史上留下个好名声。他对封建朝廷的认识是糊涂的，认为只有几个奸臣不好。一旦被闭塞的皇帝明白过来，就会惩罚奸臣。奸臣也会因其受惩罚而收敛行为，改恶从善。在这一点上宋江远没有鲁智深头脑清醒。鲁智深说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而宋江却一味追求招安，迷信招安，把招安看成是“正路”，把继续起义造反看成是“邪道”。正是这种糊涂观念、忠君思想和革命不彻底性、妥协性等因素，促成了宋江的受招安。但受招安后，皇帝继续昏庸，奸臣照样当权，梁山起义军替封建朝廷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结果不仅“劳而无功”，而且处处受排挤受迫害。这样，宋江原来的主观愿望在冷酷的现实面前碰了壁，产生了矛盾。对于这些矛盾，严重的忠君思想使宋江不敢正视，不愿解开。于是就安然地喝了朝廷赐给他的药酒死去了。他心里想：我宋江一生只讲忠义，没有罪过，既然皇上叫死就死吧。宁肯朝廷辜负我，我决不辜负朝廷。

田此有米，宋江虽然被封建朝廷招安了，但他并不是怀着险恶毒辣的目的蓄意出卖起义的叛徒内奸，而是有着严重缺点、弱点和错误的起义领袖。他终生未能冲破正统观念的束缚，忠君思想迷了他的心窍，蒙了他的双眼，致使他主动引导梁山起义军投降了封建朝廷，又替封建朝廷残酷镇压了自己的同类——田虎、王庆、方腊起义军，最后自己也落了个饮药酒身亡的可怜下场。宋江的悲惨结局是一种历史的悲剧，它深刻说明了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农民起义最后总归陷入失败的结局中，农民起义领袖的思想政治路线仍是至关重要的。

总而言之，对待宋江的评价问题，涉及到如何正确评价文艺作品中农民起义领袖人物形象的问题，涉及到如何正确看待这些农民起义领袖人物的缺点、弱点和思想局限性的问题。对待此类学术问题，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采取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以逐步求得真理。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是不行的。“四人帮”在前几年使学术理论为其篡党夺权服务，推行“一‘花’独开”的政策，对不同意见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严重地窒息了学术空气，摧残了学术上的百花。“四人帮”这种在学术上野蛮专横、以势压人的作法，我们应当引以为戒。否则人们不可能讲真话、实话，不可能求得正确的结论。我们今天评论并肯定文艺作品中一些历史人物的形象，以及一些历史人物，只是实事求是地给他们以一定的历史地位，肯定他们在历史上曾起过的一些进步作用，并指出他们的缺点、弱点和局限性，批判地从他们身上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做到古为今用。而不是把这些历史人物形象捧为今天我们学习的楷模，厚古薄今，借古非今。历史在发展，人民在前进。有些古代的英雄人物原封不动地拿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就可能是反动落后的了。譬如，就“四人帮”也不曾敢加以否定的晁盖、李逵来说，晁盖起义造反的目的是为了“图一世快乐”，今天看来显然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李逵粗鲁莽撞，胡乱杀人，有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不加以思想改造，今天也有可能进无产阶级的监狱。至于宋江，如果不彻底克服自身的缺点、弱点和思想局限性，那可真正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们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目光最远大，最富于革命彻底性，能够防止和克服任何其他阶级所不能克服的缺点和错误，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才真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对于以上说的这些，我们在研究古代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评价历史人物时应当心中清楚。